

高等院校通识课程教材

世界海洋政治**概论**

SHIJIE HAIYANG ZHENGZHI GAILUN

主编 牟方君 孙利龙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WUTP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高等院校通识课程教材

世界海洋政治概论

主 编 牟方君 孙利龙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 武 汉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海洋政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的海洋政治历史逻辑,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辉煌成就,近代中国海洋经略的艰辛曲折以及当代中国海洋战略的宏观架构,旨在帮助当代青年大学生理解、把握海洋政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提高海洋政治理论水平,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分析和解决海洋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海洋观、国家观。

本书可以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高校、职业技术学院涉海类专业通识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特色课程的教学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海洋政治概论/牟方君,孙利龙主编.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629-5524-5

I. ①世… II. ①牟… ②孙… III. ①海洋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世界-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P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6276 号

选题策划:崔庆喜(027-87523138)

责任编辑:向玉露

责任校对:张 晨

封面设计:芳华时代

出版发行: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 号

邮 编:430070

网 址:<http://www.wutp.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荆州市鸿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8

字 数:444 千字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定 价:36.00 元



凡使用本教材的教师,可通过 E-mail 索取教学参考资料。

E-mail:wutpcqx@163.com

本社购书热线电话:027-87384729 87664138 87165708(传真)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前 言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已成为当今世界共识。当下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更是文化实力和民族精神的竞争。海洋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海洋世纪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海兴国强,海衰国弱,海洋与民族兴旺、国家繁荣紧紧相连。海洋世纪国家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激烈的海洋国力的竞争。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资源等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海洋文化的竞争。海洋政治课程教育教學的目标就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把握海洋政治的基本原理、基本理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海洋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国家观,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海洋政治战略,为建设海洋强国的实践活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经由课程教育教學,将海洋人文科学的种子播撒在青年学生的心田里,让海洋文化的精粹流淌在莘莘学子的血液中,展现在未来的社会行为上,进而增强民族亲和力和海洋文化的凝聚力,推动海洋文化的大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海洋强国已是党在十八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培养以全球化思维和海洋政治理念经略海洋的高素质人才,无疑是海洋强国战略实施的关键,也是国家赋予高等院校尤其是涉海类院校的重要使命。因此,本教材立足全面介绍海洋政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的海洋政治历史逻辑,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辉煌成就,近代中国经略海洋的艰辛曲折以及当代中国海洋战略的宏观架构,旨在帮助当代青年大学生理解、把握海洋政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提高海洋政治理论水平,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分析和解决海洋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海洋观、国家观。

本书系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统一规划、部署和组织编写的系列教材之一,定位于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高校、职业技术学院涉海类专业通识课程教材,也可以作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特色课程教育教學参考用书。基于此,本教材充分尊重通识教育的基本要求,专注内容的知识性和逻辑性,强调海洋政治的历史脉络演进与现实热点考察。作为广州航海学院通识课程体系重点课程基本教学资源、广东省教育教學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本教材由广州航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策划、广州航海学院牟方君副教授设计编写大纲,具体编写工作的分工为:牟方君编写第一章、第七章,牟方君、孙利龙编写第二章、第三章,刘笑阳、杨燕编写第四章,刘笑阳、胡伟光编写第五章,杨兰、何淋编写第六章。最后由牟方君、孙利龙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

为全面系统介绍世界海洋政治的完整脉络,追踪海洋政治的发展前沿,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吸收和编辑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尤其是最新研究成果,无论是否在参考文献中列出,援文著作权悉属原作者本人,在此一并对所有涉及文献作者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最诚挚的谢意。由于编写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加之当今世界海洋强国围绕海洋权力与海洋利益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世界海洋政治生态复杂而多变,教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7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课程目标	(1)
第一节 海洋政治概论	(1)
一、政治及其基本界定	(1)
二、海洋政治的含义	(4)
三、海洋政治的展开	(5)
四、海洋政治构成要素	(5)
五、海洋政治的形成	(10)
六、海洋政治的核心	(12)
第二节 海洋政治对海洋社会的功用	(14)
一、海洋政治影响整个人类	(14)
二、海洋政治影响具体国家	(16)
三、海洋意识得到极大普及	(17)
四、耕海牧洋的竞争日益激烈	(19)
第三节 学习研究世界海洋政治的意义	(20)
一、学习研究世界海洋政治是当今中国参与世界海洋事务、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	(20)
二、学习研究世界海洋政治也是构建我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	(22)
思考与练习	(23)
第二章 世界海洋政治基本理论	(24)
课程目标	(24)
第一节 地缘政治理论	(24)
一、地缘政治理论的产生	(24)
二、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	(25)
三、“一带一路”倡议	(30)
第二节 相互依赖理论	(38)
一、相互依赖理论的界定	(38)
二、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	(39)
三、相互依赖理论的内在逻辑	(41)
四、相互依赖的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44)
五、相互依赖理论的评判	(45)
六、相互依赖理论的启示	(46)
思考与练习	(48)

第三章 世界海洋政治基本制度	(49)
课程目标	(49)
第一节 领海制度	(49)
一、领海制度及其发展	(49)
二、领海的法律地位	(50)
三、领海的界限	(51)
四、领海的无害通过	(52)
第二节 毗连区制度	(53)
一、国际海洋法中的毗连区	(54)
二、一些国家有关毗连区的立法和实践	(56)
三、我国设置毗连区可供选择的方式	(56)
第三节 专属经济区制度	(57)
一、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和意义	(57)
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起源和形成	(57)
三、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管辖权和义务	(58)
四、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	(61)
第四节 大陆架制度	(61)
一、大陆架的界定	(62)
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有关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争论	(62)
三、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大陆架的规定	(63)
四、大陆架划界原则	(64)
五、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	(67)
第五节 国际海底的法律制度	(68)
一、国际海底的法律地位	(68)
二、国际海底的勘探开发制度	(68)
三、国际海底管理机构	(69)
四、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	(70)
思考与练习	(72)
第四章 西方海洋政治列强的历史考察	(73)
课程目标	(73)
第一节 扩张时代的西方海洋列强	(74)
一、葡萄牙	(75)
二、西班牙	(76)
三、荷兰	(78)
第二节 殖民时代的西方海洋强国	(80)
一、英国	(81)
二、法国	(83)
三、俄国	(86)
第三节 争霸时代的西方海洋列强	(89)

一、美国	(90)
二、英国	(93)
三、日本	(96)
四、德国	(98)
第四节 “威慑—合作”时代的西方海洋列强	(101)
一、美国	(102)
二、苏联/俄罗斯	(105)
第五节 西方列强海洋政治的历史逻辑	(107)
一、西方海洋政治历史的普遍性逻辑	(108)
二、西方海洋政治历史的特殊性逻辑	(110)
思考与练习	(112)
第五章 中国海洋政治的历史变迁	(113)
课程目标	(113)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海洋政治思想	(114)
一、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一周期	(114)
二、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二周期	(117)
三、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第三周期	(120)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海洋政治思想	(122)
一、地主阶级的海洋政治思想与实践	(122)
二、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海洋政治思想	(124)
三、民国时期的海洋政治思想与实践	(129)
第三节 中国海洋政治思想的历史省察	(130)
一、由浅显认知向系统论述演进	(130)
二、由“重陆轻海”向“陆海统筹”演进	(130)
三、由“趋利”向“避害”再向“趋利避害”演进	(130)
四、由探索海洋政治之“术”向提炼海洋政治之“道”演进	(131)
思考与练习	(132)
第六章 中国海洋政治的当代演进	(133)
课程目标	(133)
第一节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政治思想	(133)
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理念	(134)
二、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战略思想	(135)
三、突破贸易禁运和海上封锁的战略举措	(137)
四、建设强大海军的战略构想	(138)
第二节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政治思想	(140)
一、实行以建立经济特区为先导的沿海开放政策	(140)
二、新时代的海防战略思想和海军建设方针	(143)
三、和平解决海洋争议的方针	(146)

四、“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构想	(148)
第三节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政治思想	(150)
一、从战略的高度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	(151)
二、科学制定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总体规划	(154)
三、建设具有强大综合作战能力的海军	(157)
四、提出祖国和平统一八项主张	(164)
第四节 新世纪新领导集体的海洋政治思想	(166)
一、大力实施海洋开发战略	(167)
二、新世纪海防战略思想	(171)
三、反独化统,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177)
四、致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领土争端	(181)
第五节 十八大以来新领导集体的海洋政治思想	(183)
一、“一带一路”的倡议	(183)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185)
三、强军梦	(186)
四、以大陆的发展把握两岸关系走向	(187)
思考与练习	(188)
第七章 当今中国海洋政治	(189)
课程目标	(189)
第一节 当今中国海洋政治的宏观考察	(189)
一、当今中国海洋政治的宏观环境	(189)
二、中国周边海洋安全形势	(191)
三、当今中国海洋政治的总体架构	(204)
第二节 当今中国海洋政治的难点	(210)
一、南海及其价值	(211)
二、南海问题及其发展演化	(213)
三、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	(221)
四、当前南海局势及其走向	(234)
第三节 当今中国海洋政治的重点	(240)
一、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	(240)
二、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取	(242)
三、钓鱼岛问题根源于美日私相授受	(243)
四、钓鱼岛问题的症结	(245)
五、当今中国海洋政治的重点突破	(246)
思考与练习	(248)
附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部分)	(249)
参考文献	(276)

第一章 绪 论

课程目标

1. 了解世界海洋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2. 明确学习研究世界海洋政治的意义；
3. 掌握世界海洋政治的社会功用。

海洋政治是当今致力于在竞争激烈的海洋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国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当今海洋政治地位之凸显,与人们对于海洋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人类对于海洋越来越多的索求、海洋能为人类当下及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更多保障密不可分。维护已有的海洋权益,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海洋权益,要求一国具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开拓的海洋意识、经营海洋的实力。上升到政治层面,就是要求一国大力弘扬海洋政治,使海洋意识深入人心,为一国耕海牧洋提供战略指导。海洋政治,是当今海洋社会试图谋求海洋世界话语权的国家权力共同指向的对象。本章主要就政治及海洋政治的基本界定、海洋政治的类型及特征、海洋政治的功用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简约讨论。

第一节 海洋政治概论

海洋社会是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后,各国逐鹿海洋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其直接动力来自于各国政治层面的大力推动。因此,海洋社会是海洋政治的社会。然而,自从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问世,特别是亚氏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以后,关于什么是政治或政治是什么的问题就一直是一古今中外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两千多年来,有志于或涉及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虽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是关于什么是政治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定义。与此相关,作为下属概念的海洋政治,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政治及其基本界定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政治一直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作为一个学术语词,政治为众多学术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要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时间精准理解它的内涵,也绝非易事。在我们看来,作为一个概念的“政治”,应该从“政治是什么”“什么是政治”两个方面去把握。前者界定“政治”的本质与内涵,后者则廓清“政治”的形式、范畴与外延。以往颇多研究者在理解“政治”概念时,正是在此出现偏颇,以致他们的定义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可见,给出一个准确的“政治”定义,必须辩证地从这两方面去把握。

(一)政治的基本语源

在语源上,早在《尚书》《周礼》等典籍中,“政治”一词即已出现,如《尚书·毕命》中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中有“掌其政治禁令”。在贾谊的《新书·大政下》也载“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说苑·敬慎》也记有“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等语句。只不过在古代中国,“政”与“治”更多是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制度、行政、准则、道德等,《论语》中出现“政”字 50 多处,如《论语·颜渊》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左传·昭公六年》也有“政者,制也”“启以夏政,而作禹刑”的记载。“治”是指治理,即管理国家和民众,如《礼记·经解》中有“治者,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等语句。大体上,在古汉语中,“政治”一词指君主和官吏管理国家及民众之事,即所谓的“治国平天下”。随着西学东渐,尤其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政治”的使用渐次世俗化,“政治”语词的含义也随之变得繁杂。

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都来自希腊语 πολι 。据考,该词最早记载是在《荷马史诗》中,初义为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简称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后又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其他西方语种,如德语、法语、俄语等的“政治”,都与古希腊语“ πολι ”有词源关系,且在拼读上也十分相似。因此,西方文化中,“政治”一词的最初含义就源于城邦(City-state),本义就是指“城邦或城邦活动”。

可见,在不同文化中“政治”一开始就有所分野。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政治”即“治国平天下”,就是政与治,就是国家的统治与管理,求得天下的太平;欧洲文化中的“政治”就是城邦,是一种为国家的实践,追求国家利益的实体与实证。欧美政治、政治家、政治学者历来重视政治(学)实证,重视政治(学)科学化、系统化,讲究法治;中国历代政治、政治家、政治学者则重视以德为先、攻心为上,讲究德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西方文化赋予“政治”不同的本质内涵。

(二)政治的诸多定义

在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以上原因以及不同政治学主张的实际研究对象及范围的不同,西方政治学、政治学家对“政治”概念的界定是各不相同的。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恢复政治学的建设以来,政治概念就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经过 30 年的发展,这一概念已从起初孤家寡人式的国家阶级论,形成多角度下定义的态势。一方面是在传统马列主义范围内挖掘,予以丰富、系统化;另一方面则利用改革开放的政策,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政治理论。这样做的结果,既拓宽了学科的基础,也使过去一度沉寂的政治学领域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种生机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学术争论。当然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整合,辩明真理,揭示政治的科学含义,进而构建政治科学的理论大厦。据粗略统计,我国和西方学者或论著对“政治”给出明确的且有较大区别的定义有 100 多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11 类。(1)把政治说成是道德与伦理,是一种善业或善举的道德论。如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理想图”就是“公道或正义之国”,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看作实现正义,为民谋利以求善业之行为。(2)认为政治是一种超自然的、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是代表神的力量神权论。如中国的“君权神授”,“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的“尘世乃神之安排,国王受命于上帝,国王权力神授”。(3)自 20 世纪 30 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流行的认为政治与

权力有关的权力论。典型代表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即“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政治研究即是对权势及拥有权势者的研究”。在我国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学者认为“政治是命令与服从的强制关系”，“政治就是公共的强制力对众人之事的治理”。(4)政治即国家的国家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学就是研究国家的科学。“国家现象在其千变万化之中，对于家庭、部落、民族以及其他社会团体而言，虽不是毫无关系，但终究有所不同。这种特殊的国家现象，就构成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简言之，政治学从头到尾是一门研究国家的科学。”“政治就是国家机关和国民行为直接关于国家根本之活动底总称。”一句话：“政治就是国家。政治学便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说，或竟可以称之为：国家学”。(5)把政治解释为一种管理(管理行为、管理活动或管理系统)的管理论。孙中山先生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我国政治学家吴恩裕说：“政治乃是用公共的强制力对于众人之事的治理。”我国政治学家高一涵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国外行政学界也大都视“政治”为“管理”。(6)认为政治就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现对各种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的分配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他曾说“政治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试图对一个社会中从事价值分配的权威性政策作一系统了解”，“政治学就是研究一个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7)“政治是一种法律现象，是制定、执行和遵守法律的过程”的法律论。如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森曾说“我们只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法律现象，一个法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所创立的社团。国家作为一个法人，是这个社团的任务化，或是构成这个社团的国家法律秩序的人格化”。(8)政治就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的过程论。布莱克维尔在《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认为：“政治可以被简要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做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过程论大多强调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因此，也可称为“政策论”。(9)把政治说成是“权术”“统治术”“阴谋诡计”“权谋”“策略”“厚黑之术”等的世俗论或统治术论。韩非将法、术、势相结合，认为政治就是君主的“南面之术”，就是“集势以胜众，任法以齐民，因术以御群”的统治权谋。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说：君主主要像狮子一样凶猛，狐狸一样狡猾；政治就是用权力统治人，用权力欺骗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残酷、欺骗、背信弃义、不合法等均可。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也持类似观点：政治就是当政者运筹帷幄之活动。(10)把“政治”视为一种活动、一种行为的活动论。在中国古代，政治一向被视为治国安邦之活动。在国外，这一认识也为大多数政治学者、政治家所赞同，他们认为政治或者是国家的管理活动，或者是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活动，或者是“选择公务员并促进政策的活动”，或者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11)本质论。如《政治学》称：“所谓政治是指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政权、组织国家政权、巩固国家政权，并运用国家政权进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全部活动。”《政治学概论》称：“政治是建构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利益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特定的实体、关系、活动和观念的总和。”

在逻辑学的语境，概念在于属加种差，然而上述定义均未能准确揭示出“政治”与其属概念(活动、关系等)之间的种差。现时研究者也注意到这种情形，新近出版的政治学教科书与相关论著都在尽力弥补此种缺失，力求给政治一个简明的界定。如《现代政治学原理》：“政治是特定的集团和个人，为了自身利益，围绕国家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活动和产生的关系。”然

而这种尝试,又陷入循环定义或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同时,这些界定大多只讨论了“政治是什么”,而未继续回答“什么是政治”,缺乏对政治现象完整与辩证的把握。

(三)政治概念的基本界定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出现在阶级对立和国家产生之际,密切相关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在利益分化的社会环境中,各权力主体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发生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冲突,从而决定了政治斗争总是为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基本属性。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权力的追求以及某些心理的满足等,对于各种权力主体来说,都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动力。

界定政治是政治学科理论建构的起点,也是政治学科发展的重点。目前我国关于政治概念百花齐放的争论现状,既是政治学繁荣和发展的表象,又是其发展不足的证据。因此,如何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事物发展之初的多向度,提炼有本国政治科学发展特色的政治概念,应该是学科成长的必经阶段。在我们看来,“政治是有关政府权威性决策及执行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其中,所谓权威性是指政府行为所具有的强制性、至上性与全面性的特质。“有关”意指政治不仅包含政府权威性决策及执行活动和关系,而且包含公民、利益集团、政党以及其他一切组织对政府体系的投入、参与、监督活动和关系,以及公民、利益集团、政党等组织对政府权威性决策及执行的地位和权力的争夺活动和关系。这样,政治就本质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政治以政府行为为核心,而政府行为包括决策及执行行为与其他一切个人、组织的行为相比,本质的区别则在于其所独具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行为性质上的强制性,突出表现在政府可以使用合法性武力为后盾,而其他任何组织皆无此后盾。当然,可以使用并不等于必须使用,这种后盾对于正常社会的统治和管理而言,多是陈而不用,但起威慑作用而已。第二,政府行为效力上的至上性。家庭、学校、企业、工会等其他社会组织所无法管理的事,或者是无法调节的矛盾与冲突,皆可诉诸政府,由政府行为作最后的裁决。第三,政府行为在适用范围上的全面性。政府是特定的地缘范围内最大的组织,政府行为相对于任何社会单位(小至乡镇,大至国家都是社会单位)而言都是对整个单位的,如我国国务院行为的效力及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政府行为的效力及于整个北京市。其他组织的行为效力,只及于本组织的成员,只及于社会单位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

二、海洋政治的含义

根据上面对政治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海洋政治:海洋政治是海洋社会的权力指向,即海洋国家之间有关海洋权益的决策及执行并相互影响的社会活动及其关系的总和。有的学者则把海洋政治进一步具体化为“主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而发生的矛盾斗争与协调合作等所有政治活动的总和”。从利益目标角度看,海洋政治实质是海洋社会的利益分化的产物,即在海洋利益分化时发生的、人们运用社会强制工具对海洋事务进行全面管理的系统过程。绝大多数国家在近代以前根本不重视海洋,海洋政治更鲜有人提及,在那种环境下的海洋政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名存实亡。另外还要明确指出的是,当今世界约有1/4的内陆国家,海洋政治在这些国家中无法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有一点点海洋政治,也会受制于与其相邻的临海国家。此外,海洋政治势必与其他沿海国家或者靠海国家发生联系,进而对其他沿海国家或者靠海国家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刺激

他方做出种种反应。因此,海洋政治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三、海洋政治的展开

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被天然地割裂为几大区域。各区域之间虽然偶尔有联系,但既不频繁、规模也受到限制。公元前5世纪波斯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不过很快就土崩瓦解。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缺乏便捷、有效的交通方式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罗马也曾把地中海变成帝国的内湖,不过,其战略重心一直局限于欧洲地区。当时的汉王朝虽曾派出使者试图与罗马交好,但由于受到海洋的阻隔,最终未能如愿,使者只得从陆路原路返回。16世纪以后,世界各地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到了今天,借助于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已经把地球变成一个真正的村落。在这一点上,海洋政治功不可没。世界联成一体其起因固然来自西方世界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与索求,而把这种向往与索求变为现实的则是来自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海洋政治的直接推动。

海洋政治与政治并非同步产生。海洋政治最先出现于欧洲,欧洲人在争夺海洋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雅典、罗马是古代重要的海洋国家;近代以来,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最先开始环球航行,引领人类迈进海洋时代;当今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强国通过多次海外战争将海洋政治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类的生产力不断发展、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当人类有了一定征服海洋的能力时才产生了海洋政治。在1500年前后,欧洲造船技术有了很大提高,西方人把从中国传去的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与此同时,由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寻找更多的原料产地;另外,欧洲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的广泛传播、致富光荣观念的流行,加上《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当时中国之富庶的描绘导致当时的西欧社会盛行一种到海外淘金的热潮。以上三个方面造成了在政府主导下开发海洋活动的欧洲走在世界前列的局面。

尽管西方人有关海洋政治的理论研究比到海外探险的实践要晚很多,不过在海洋政治理论研究这一点上西方仍然走在其他地区的前面。美国海军将军马汉的“海权论”系列著作可以视为海洋政治领域研究中具有开拓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代表性著作。马汉有关海权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国际环境下的美国利益》《亚洲的问题》《海权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等。此后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海军部长莱曼、苏联海军元帅卡皮塔涅茨·伊万·马特维耶维奇均出版过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海洋政治著作,这些著作进一步奠定了海洋政治学的理论基础。虽然近些年来,亚太地区的一些新兴国家海洋力量有了显著增长,海洋政治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在海洋政治理论方面尚缺乏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和受到国际社会重视的学术观点。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事实上从实践到理论,欧美国都占据世界海洋政治舞台的中心。

四、海洋政治构成要素

海洋政治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以对海洋权益的发现、占有和保持为目的的政治活动的总和。其中,海洋意识、航海技术和海洋收益是制约海洋政治发展的三大关键要素,对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海洋政治的认识和关注。

（一）海洋意识是海洋政治发展的思想动因

海洋意识是对海洋与国家兴衰内在联系重要性的充分认知，“是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海洋覆盖着地球表面积的71%，浩瀚的海洋世界是一个万水汇聚的整体，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国家的成长壮大密切相关。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早在2500年前就曾说过，我们面对的世界可分为两部分——陆地和海洋，每一部分对人类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如果想进一步扩张国土面积，就必须从陆地向海洋发展。古罗马的政治思想家西塞罗曾提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的论断。当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海洋主要是指地中海及其周边水域，并非人们现在所说的海洋。现代海洋意识的形成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形成的。在这片广袤而崭新的海洋，曾上演了一场场激烈的争夺与搏杀，见证了地区和世界霸权的兴衰起落，演出了一幕幕“群雄闹海”的历史剧目。

海洋是将世界各大陆连接起来的桥梁，是任何一个国家繁荣富强必不可少的“土壤”。正如海权论的鼻祖、美国海军上校马汉所说：“假如国人对于海洋事务的思想意识不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不可能认为决定着国家繁荣和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因素存在于海洋之上。这个主题不仅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重要性，也关系着世纪历史和人类的福祉。”在这一场场历史剧目中，最先登场的是葡萄牙人。由于葡萄牙人最早意识到开拓、探索海洋的重要性和对黄金等财富的渴求，他们最早走出了狭小的陆地国土空间，称霸海上，建立了从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到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直至远东地区的庞大殖民地，成为统治海洋几近一个世纪的全球性海洋霸主。

葡萄牙人的成功刺激了其近邻西班牙人，于是，他们也随之展开了对海洋的探险和争夺。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麦哲伦全球航行的成功，西班牙人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这两个国家为了各自的海洋利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不惜将争端提交到罗马教皇法庭进行仲裁。罗马教皇为了保护天主教在这些新发现土地上的垄断地位，从1493年起，对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不断地进行劝导、调停和仲裁。1493年5月4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训谕，指定了大西洋上的一条子午线作为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所谓非基督世界的分界线。之后，两国于1494年6月7日签订了《托尔德西拉斯条约》，1529年又签订了《萨拉戈撒新约》，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处再画一条线，线东“发现”的土地归西班牙，线西“发现”的土地则归葡萄牙。“根据这两个协定，西班牙几乎独占美洲，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则包括整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巴西。”经过长期争夺，西班牙最终击败葡萄牙，结束了葡萄牙人一个世纪的海上霸主地位，掌握了欧洲和东方各国及美洲的贸易垄断权，建立起的领地遍及世界各新兴帝国。

海洋世界中没有永久的霸主。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世界各国对海洋的重要性有了充分认识，他们纷纷加入到对海洋利益的争夺之中，英国就是其中之一。英国在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又先后击败了荷兰等多个对手，在全世界建立了比国土面积大100多倍的殖民地，从而确立了海上霸权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而这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英国海洋意识崛起的结果。正如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所说：“自人类开始利用海洋以来，历史上的最大教训即是当世人自我局限于大陆战略的束缚，其结局必然失败。”海洋能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是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主要方向。

历史是真理的诠释者，它能给人以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向海则兴，背海则衰，几乎所有

的海洋国家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这是世界历史和海洋政治的基本事实和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识。因此,自人类把目光转向海洋的那一刻起,寸土必争就转为寸海必争,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缺乏海洋意识就要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对此,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曾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在发展生产力和积累国家财富的过程中,海洋的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文明通常在海洋沿岸产生和发展,人民与航海业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就比其他国家更早地成了经济强国。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出现了利用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及其财富的迫切需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指出:“历史反复昭示人们,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为开发海洋而进行合作,给各国带来了发展,但是为了争夺海洋而发生的战争,则给人类带来灾难。”

虽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由观念单独引发的,但如果没有观念的变革,社会难以取得巨大进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洋意识是海洋政治发展的思想动因,是海洋政治发展的精神推动力。如果没有海洋意识而奢求海洋政治的发展,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海洋意识的强弱,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状况的好坏,而且也反映了其海洋防卫能力的大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海洋知识与航海技术是海洋政治发展的双重保障

海洋虽然是天然的交通通道,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但其毕竟波涛汹涌、变化莫测,危险常在,鉴于此,必要的海洋知识与航海技术成为海洋政治发展的双重保障。大航海时代是人类海洋政治的开端,此时,海洋知识与航海技术所具备的条件成为人类开展海洋政治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什么人类对海洋的发现要等到15世纪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海洋知识与航海技术制约的影响。

15世纪末,随着西欧生产力的发展,天文、地理、航海以及造船技术日新月异,为远洋航海及开辟新航路创造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也为海洋政治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因为这一时期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们不仅要同神秘莫测、变幻不定的海洋进行抗争,同时还要与当时社会主流的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谬误迷信进行不懈的斗争,以摆脱束缚航海与探险思想的樊篱。正如一位学者形象且深刻的阐释:“在地理大发现的前期,探险家们面临的障碍与其说是风浪,不如说是迷信,因为此时各种各样的迷信仍然大行其道、流传甚广。譬如在遥远海洋中有非常巨大的海怪,它能把各种各样的船舶轻而易举地吞掉;炎热地带会把海水也照射得像沸腾的开水一样,会随时把人烫死、融化;海底有巨大的磁石,会把船体上所有的铁钉全部吸去,让大船顷刻之间解体并沉入海底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表明,在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专制暴君,而是人类内心某些先入为主而又顽固不化的错误观念。如果人类不克服这些荒诞迷信的思想观念,就很难向前走出半步。

此外,15世纪的造船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过去靠风力吹动的旧式三角形“拉丁式”帆,只适合于在近海航行,在这个时候已出现了新式大型多桅、多帆(有直帆、斜帆)、安全迅速、宽敞、吃水较深的大海船。这样的大海船可以随时调整风力,依靠指南针和海图进入浩瀚的大海。欧洲在15世纪末又出现了一种“牢”型船。这种船有三个桅杆,载重400吨以上,有较高的艏楼和艉楼。前桅杆、主桅杆都挂大方帆,后面的桅杆则挂三角帆。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造船技术发展得更为迅速,葡萄牙在16世纪已经能够造出七层甲板、载2000人的卡拉克船。另外,从1400年起,欧洲的船出现了艏舵,取代桨橹来把握方向,大大提高了船舶的灵活性,便于操纵。

要想在茫茫大海上进行比较安全可靠的跨洋远航,除了需要一定水平的造船技术外,还需要相当水平的航海术。其中最主要的技术有三项:一是要有能确定航线及量算距离的海图;二是要有确定航向方位的罗盘;三是要有根据日月星辰量算维度、确定船位的星盘、量具。对于此方面的技术,欧洲在大航海时代处于领先地位。

由此可见,这些条件都是海洋政治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有过精辟阐述:“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也就是说,交通工具的革新是形成世界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海洋政治的必要条件。因为单靠原始的交通工具,诸如小木船、马车、商队等,要形成全球性的普遍交往,完全不可想象。因此,以新式帆船为代表的交通工具虽然不是产生世界历史和海洋政治原生的、第一性的因素,却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现,缩短了各民族间的距离,使大量的货物流通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直接到达遥远的国度,使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成为人人可以感觉到的现实。德国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一文曾提到:“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

(三)海洋收益是海洋政治发展的动力

自大航海时代开辟了海洋政治以来,海洋政治对各个国家的影响就已经初露端倪。海洋给予了最先走向海洋的国家以丰厚的回报,因此,其也被认为是商业财富的源泉。1500—1750年,欧洲人通过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不仅增加了社会财富,也增强了国家实力。“许多事例证明,贸易——首先是对外贸易——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来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而财富则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的实力,正如实力是获取财富的基本手段一样。于是,财富与实力就成了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

正因为如此,英国政治家芮莱才用精练的语言概括道:“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可以控制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可以说,海洋收益无疑成为各国从事海洋政治的最直接驱动力。

以15世纪初的葡萄牙为例,其国内的情况为海上扩张创造了大好时机。葡萄牙的海上扩张符合多数阶级、阶层的利益。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扩张主要是一种移民、殖民形式,是向无人居住和只有原始部落居住的地区移民、殖民,为的是追求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摆脱专制压迫、剥削。对于教士和教会来说,扩张意味着传播基督教,教化异教徒和“生番”,为上帝效劳,扩充基督教势力,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收入(宗教的影响在葡萄牙是巨大、深沉的,其在收复失地、与穆斯林较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贵族来说,扩张意味着占领土地,为国王效劳,赢得俸禄、封地、官职,而这些机会在狭小的葡萄牙本土(约9万平方千米)越来越难。许多葡萄牙贵族在收复失地以后无所事事,除了领兵打仗不屑做其他事情。

于是,他们转守为攻,继续同北非沿岸的摩尔人进行残酷的战斗。摩尔人也时常骚扰葡萄牙海岸。另一方面,已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需要熟练的水手和船长。因此,与摩尔人的战斗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葡萄牙贵族把马匹换成船只,把盾牌盔甲换成罗经星盘,使骑士变成水手,贵族变成船长。对于商人来说,扩张则意味着生意兴隆,可以把在产地购买的原料高价转卖,推销商品,控制重要商路。此外,对于国王和宫廷来说,扩张可以提高威望,特别是可以开辟新的财源,扩大版图和自己的权力范围。只有那些经营农业的地主、农场主无利可图。对他们而言,国内劳动力外流意味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利益减少。因此,扩张是解

决葡萄牙国家和社会生活各种矛盾的一种方法。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国王与贵族的矛盾、贵族与人民的矛盾、富人与贫民的矛盾、城市与城堡的矛盾,都可以在对外扩张中得以缓解。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扩张还可以获得国内匮乏的各种资源,发展经济,同时可以转移人口,减轻人口压力。葡萄牙1500年时约有125万人口,今天看来是地广人稀,但在当时来说,则显得地狭人稠。

16世纪,欧洲国家的黄金拥有量从大约55万千克陡增至119万千克,白银从约700万千克猛涨至2140万千克。16世纪中叶,欧洲国家在殖民地采掘的金银比征服美洲前的采掘量多4倍。欧洲各国流通的贵金属硬币重量在16世纪增加了3倍。此外,西欧还在日本换得了大量金银。

1546—1645年一个世纪里,欧洲国家换得的日本金银总价值为8000万英镑(sterling),相当于同时期从美洲获得的总价值为2.9亿英镑金银的27.5%。其中,西班牙占有的殖民地最多,掠夺的金银量也最多。1500—1650年间,从美洲合法运抵西班牙的黄金就有18.1万千克,而且更多的金银是通过走私、海盗、直接贸易流入西班牙。从美洲正式流入的贵金属使欧洲的全部黄金储备每年递增5%,因而西班牙的物价也上涨最快。

近年来,海洋收益对海洋政治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人们毫不避讳地认为,21世纪是世界各国谋求经济利益优先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利益的新世纪。“世界舞台上的重头戏将由‘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经济振兴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赛的主战场。”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和从事航海事业的文明古国之一,其很早就认识到海洋提供的“舟楫之便、鱼盐之利”。在距今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就已经发现山顶洞人能够利用贝壳作为装饰品;之后在先秦时代开始了“海耕”,而历史上也有过关于“骆田”的海洋农业的记载。但要认识到的是,中国的文明区域从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秦汉时又进一步扩展至珠江流域,这些都是先有地理探险发现,后有移民拓殖,其后才是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共同开发,绝大部分开拓、旅行、探险活动仍以陆地为中心,海洋探险显然无法与张骞、班超等久负盛名的陆地探险旅行相提并论。除了秦汉时发现海南岛,三国时发现台湾岛,中国古代便不再有较重大的海上探险及地理发现。虽然郑和下西洋打破了重洋阻隔,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但永乐皇帝“遣使以即位招谕……诸国”主要以“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为目的的行为,使得下西洋行动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至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则是次要的,更无“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和开疆拓土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永乐皇帝驾崩后,海上活动被严令禁止,中国便进入了漫长的“海禁”时期,错过了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格局和参与地理大发现的好时机。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海洋的认识是以陆地为背景的,其弊端主要有两点:“一是把海洋理解为近海,理解为防御,海洋只不过是大陆安全的护城河;二是把海洋看作是维护专制的手段。”鉴于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说“尽管中国靠海,并在古代可能有着发达的航海事业”,但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此话虽苛刻,但不乏发人深省之处。另外要提到的是,虽然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远远超过哥伦布和麦哲伦的,但遗憾的是,郑和的船队没能够完成新大陆发现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只有海洋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要素是难以推动海洋政治发挥作用的,这三要素彼此互为条件、缺一不可。

综合而言,中国人未能参与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很多,政治地理环境的制约和经济地